

废墟上的 幽灵

顾笑言



5

87
I247.5
2443

BX60/20

3

废墟上的幽灵

顾笑言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B

363119

废墟上的幽灵

顾笑言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625印张 3插页 156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9,380

书号：10368·215 定价：1.45元



作者像

目 录

废墟上的幽灵·····	(1)
杀人工厂·····	(38)
这里不囚禁阳光·····	(87)
他曾播种幸福·····	(174)

废墟上的幽灵

长春电影制片厂专门招待外请作家的招待所叫小白楼。因为那座东洋式的两层小楼，是粉刷成白色的。据说，是伪满洲国时期一位日本大臣专门为他在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当演员的情妇修建的。今天看来，小白楼已经有些破败。可倒退几十年，追溯到它刚刚落成的时候，就不能不说它是相当豪华的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都铺着红漆地板。夏季起居室，冬季起居室，室内的建筑充分体现了日本建筑的风格。楼下的客厅，用的是欧式壁炉。串连主仆住宅的门廊，也颇具异国的情调。只是因为时间的久远，风剥雨蚀，在日本建筑讲求实用的华丽之中，又透出了一点古朴的味道。

小白楼座落在厂区的尽东头。在六层的现代化洗印大楼没有动工兴建之前，它的四围都是高大的阔叶的白杨树。因为远离尘世的喧嚣，这里安静得象世界的尽头。尤其是夜里，作家们各自埋头写作的时候，小白楼就沉寂得让人觉得有点难以忍受了。

大概因为这一点吧，住进小白楼的作家，不论你是久负盛名的大师，还是初露头角的新秀；不论你是华发两鬓的长者，还是青春焕发的少年，大家都渴望在创作之外的时间里进行交流。在作家群里，能歌善舞的活跃分子，实属凤毛麟角，而振振有辞的

雄辩之才却大有人在。他们的交流方式也受这特点的局限，动口者为多。

尤其是每天晚饭之后，大家顺着白杨林中的小路散步，谈起来天南地北，海阔天高。但总有一个人担当主讲。这要看作家自己的经历如何。譬如有一位作家，曾长期生活在西藏。他的喇嘛活佛，冰山女神之类故事，几乎占领我们饭后散步的话题达半个月之久。后来，又有一位新疆的编剧，用帕米尔的故事和伊犁河的传说，吸引我们一个星期。

说老实话，我个人的经历是最单调的了。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毫无值得夸耀之处。所以，只有出耳朵听的份儿。不过，我这个“听长”没有当上多久。有一天，我突然被那些故事大师们点了名。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这些天，把我们的故事听了不少，总不该心安理得。今天，非得由你来讲一个故事不可。”

被点将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点问心有愧。但又无计可施。

这时，有一位作家提醒我说：“哎，听说小白楼里闹过鬼。你就讲讲小白楼闹鬼的故事吧！”

关于小白楼闹鬼的故事，我是了如指掌的。因为那是某一位擅长编故事的作家，为了吓唬一位胆小的女作家编的。因为那闹鬼的故事既象真的，又象假的；既象编的，又象是曾经发生过的，所以，反倒被传开了。

当时，我们正路过一片解放战争时期留下来的废墟。那地方原来有一座灰色的小楼，伪满洲国时期叫湖西会馆，是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一带最大的特务组织青龙会的首领干柏正彦的公馆。据说，长影的厂址，就是当年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干柏正彦的公开身份，就是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的经理。所以，至今在长影办公大楼的前厅地板上，还有两条瓷砖砌成的青龙。

如今长影的许多满映时代就在这里工作的元老们，对于柏正

彦其人是有过接触的。我曾道听途说过一些骇人的故事。受到那位编造小白楼闹鬼故事作家的启发，我准备把干柏正彦的故事真真假假地编造一番。

于是，我指着白杨林里的那片废墟说：“好吧！我就讲一讲这片废墟上发生的故事。不过我得首先声明，我的这些材料都没有经过核实。其中有真有假。如果你们甘心上当受骗，我就给你们讲。如果你们用历史学家和专案组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故事，那我就只能向各位表示歉意了。”

我没有想到我的那几位作家朋友会如此宽宏。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关系。你只要能自圆其说，别漏洞百出便可以了。”

我一看这几位并不太挑剔，所以，又得寸进尺，说：“连这一点我也不敢保证，愿意听么，我就讲，不愿意听，就另请高明。”

那几位大概实在无聊，其中一位性子特别急的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今天晚上我们算认定了。你就是讲个爷爷奶奶样我们也不管。赶快讲吧。有讨价还价的工夫，故事早就讲完了。”

既然如此，我已经没有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我这真真假假的故事。按照惯例，任何一个故事都得有个名。为了耸人听闻，我给这个故事取个名字叫：《干柏正彦的幽灵在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游荡》。没想到，这名字一说出来，就受到众人的反对。说这么长的名字，简直快够一篇小说的字数了。于是有人当场简化为《废墟上的幽灵》。我觉得这名字确实胜我一筹，点头认可。于是，开始了我的叙述。

一 干柏正彦哪里去了？

史无前例的浩劫一开始，电影制片厂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主楼的大厅，摄影棚里外，到处是张三罪该万死，李四死有余辜。开始时，用的都是大白纸。后来，因为革命对生产促得不够，纸张紧张，于是，就节约闹革命，用仓库里的旧报纸了。

俗话说：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用白纸写的大字报，未必就有用废报纸写的有份量。其中，有一张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贴在主楼大厅的正中，标题就叫《干粕正彦哪里去了？》，可谓一鸣惊人。又因为这篇大字报的写法接近中国的章回小说，所以，格外引人入胜，一时围观的革命群众里三层，外三层，里外三层之外，还有人跷足引颈。

那大字报开头的一节，叫干粕正彦何许人也。文中说：干粕正彦原是天皇陛下监狱之中的一名囚徒。因为暗杀日本共产党议员，被判二十年徒刑。后来被天皇陛下保赦出狱，派往伪满洲国，成为天皇陛下在伪满洲国的一名高级坐探，统管遍布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日本特务机构。

干粕正彦来到东北不久，亲自策划和参与了轰动世界的皇姑屯事件和灭绝人性的黑龙江省撮罗子沟惨案。在那次惨案中，干粕正彦亲自指挥把全屯的一百三十二名老幼妇孺，全部斩尽杀绝。

后来，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出任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总经理，住在湖西会馆。

当年的湖西会馆，戒备森严。虽然与小白楼近在咫尺，却与小白楼截然不同。

小白楼因为是大臣情妇的宅邸，女主人又是演员，所以，终日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而湖西会馆，却如坠长梦，门能罗雀。它的所有百叶窗，终日垂下。几条欧洲纯种狼犬，守护在会馆内外。据当年在满映供职的老人们讲，他们虽在满映多年，却从来没有接近过这座神秘的建筑。偶尔，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

将和关东军的其他要员登门拜访干柏正彦，湖西会馆周围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作为天皇陛下的亲信，干柏正彦很注意自己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首先，他不近女色，俨然是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据当事者说，他对作为占领者的日本人，非常严厉，动则训斥，责难；而对亡国的伪满洲国职员，却总是笑容可掬。

如今的长影主楼的二楼平台，是他每天清早必到的地方。他站在那里，同清早来上班的满映中日职员打着招呼。为此，很少有人敢于迟到。从外表上看，他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总经理。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突然造访湖西会馆。据当时在湖西会馆当仆人的老王头回忆，那个矮瘦的老头，与干柏正彦一直密谈到凌晨，两名关东军将领离开湖西会馆的时候，天已微明。后来才知道，这些日本战犯已经得到了苏联红军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整个战局，已经朝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崩溃迅速发展。

十一日晚上，干柏正彦还亲自策划了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向通化大栗子铁矿方向转移之事。

十二日清早，干柏正彦穿了一身崭新的黑色西装，打着黑色的领带，面带倦容站在主楼二楼的平台上。他让手下的人把满映全体职员都拦阻在平台前的广场上。八点钟整，干柏正彦在平台上对全体下属，发表一番调子很凄凉的诀别讲话。

他的中文讲得很流利。这番话的大致内容是：各位同仁，值此，天皇陛下的大日本帝国生死存亡之际，请允许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布，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从今天起宣布解体。每个人可以到庶务课领取三个月的薪水，各奔前程。希望各位多加保重。

而我本人，做为天皇陛下的臣民，没有为国家尽力，感到十

分惭愧。卑职在满洲映画株式会社供职期间，对各位多有不恭，敬希各位不要记住我的坏处。

干柏正彦讲演结束之后，向全体职员行了三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退入平台内的议事厅（即现在的长影党委会议室）。

当时在伪满映供职的中国人，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日本军队仓皇撤离的情况，和干柏正彦的讲话中，都意识到做亡国奴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所以，一个个心中无限欢欣。而那些一度耀武扬威的日本官员们，却一个个面色如土，有的竟声泪俱下。

八点四十分。即干柏正彦讲演结束之后二十分钟左右，议事厅突然传出几个日本职员悲痛的哭声。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对于有亡国之恨的中国职员来说，这哭声多少解了一点积淤心头的仇恨。侵略者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一天。但被侵略和压迫的人民，却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后来，传出消息说，这哭声并不仅仅因为日本侵略者大势已去，灭顶之灾将至，还因为神秘而又掌握着巨大权利的干柏正彦服毒自杀了。

九点钟整，还没有遣逃的日本职员和一部分被裹胁的中国职员，在议事厅举行了向干柏正彦遗体告别的仪式。

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干柏正彦的遗体安放在议事厅中间的两张拼起来的办公桌上。桌面上铺着白色的桌布。干柏正彦还穿着早晨讲演时的黑色西装。看来，自杀之举是早有准备的。遗体的脸色青紫，头部微微向窗子方向倾斜。一个身穿白色长工作服，头戴白卫生帽的日本女医生，手里拿着白色的纱布，不断擦着从干柏正彦口中流出来的淡黄色的粘液。

因为当时留在厂里的日、中职员已经寥寥无几，所以，整个告别仪式用了不到十分钟。

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干柏正彦的几名亲信，就用蒙在办公桌上的那块白色桌布，将干柏正彦的尸体经主楼西侧门，抬

回湖西会馆。并且，派人到二马路一家棺材铺，买了一口中国式的棺材，在湖西会馆装殓。大约在中午之前，将干柏正彦埋葬在湖西会馆以东大约五十公尺左右的一片白杨林里。据推测，就是现在长影游泳池一带。

第二天凌晨，苏联红军开进伪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

原来，苏军情报部门对于干柏正彦的真实身份和他在伪满洲帝国的重要地位是十分清楚的。在干柏正彦的手中，很可能掌握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情报人员名单和大日本帝国的许多核心机密。这些情报不仅在战时有它重要的价值，还可能关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和安全。

所以，那天早晨，苏军远东集团军情报部的一位上校，带着副官和警卫人员，匆匆赶到满映大院。当时，在满映供职的日本人，早已作鸟兽散。上校找到了住在满映附近的一位置景工人，通过翻译询问：“干柏正彦哪里去了？”

工人告诉上校说：“那小子活腻烦了，自杀了。”

上校一惊：“自杀了？”

工人怕上校不明白，作了一个蹬腿闭眼睛的动作，说：“死了！”

上校马上说：“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

工人说：“埋了。”

上校追问说：“埋在哪里？”

工人觉得纳闷。这个黄头发、蓝眼珠、高鼻子、大个儿的苏联军官找那个死尸干什么。他向主楼东边的树林子一指说：“就埋在那边的树林子里。”

那时候，人们还比较迷信，那工人觉得刨坟挖尸不大吉利。再说八月份正是伏天，说不定那尸体早就臭了。他回答完上校的话，马上就想溜之大吉。谁知上校死死地缠住他不放。

上校跟副官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副官便乘上车走了。而上校本人通过翻译告诉工人说，他必须带他们去看干柏正彦的坟墓。工人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上校、翻译和两名警卫，绕过主楼，经过湖西会馆，一直来到那片白杨林里。

干柏正彦的坟，修得并不大。因为那些埋葬他的人们，不知道自己葬身何处，只匆匆地把那口红头的大棺材盖住，便各自逃命去了。不过，那苏军的上校，倒是很排场。他是派副官调兵去了。过了不一会，小汽车领着一辆大卡回来了。那大卡车拉来了整整一个班的工兵。那些工兵，不仅脖子上挎着轮盘枪，而且随身还带来了修筑工事用的铁锹和十字镐。下车之后，班长整队完毕，立刻向上校敬礼报告。上校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工兵们立刻开始刨坟。只几分钟，棺材便被从坟坑里抬了出来。两名战士用镐头从下往上敲击棺材的盖子，把钉子砸活动之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棺材盖抬开。然后，从棺材里把用白布裹着的尸体抬出来，放在草地上。

那工人原来很害怕见到干柏正彦的尸体。但现在，见这一大群苏军的官兵对这具尸体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反倒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也挤在上校的身边，看那战士一点点把裹着尸体的白布打开。白布揭开之后，那工人禁不住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那白布之中包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干柏正彦的尸体，而是一块擦脚的羊皮地毯！

上校气急败坏地冲那块地毯踢了一脚，然后，回过身来问那工人：“干柏正彦住的湖西会馆在哪里？”

工人指指西边不远的小灰楼说：“那就是。”

于是，上校又带领他的一群人，来到了湖西会馆。这里，楼上楼下，都很整洁。看来，干柏正彦是有充分准备的。因为所有的桌子抽屉和柜子，都象冲洗过一样干干净净。他们能够看到的

一点文件的痕迹，便是壁炉里那一堆厚厚的纸灰。上校用炉前的一只铁勺子拨拉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一块残留的纸片。看来，干柏正彦用这把炉勺子翻动这些纸灰，比上校还要细致得多。

干柏正彦失踪了。活着的干柏正彦没有了，死了的干柏正彦也没有了。除了湖西会馆那座灰色的小楼，干柏正彦没有留下任何他存在过的痕迹。

二 证人突然死亡

凡是参加过长影大院举办的省市文化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志们，谁都不会忘记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时的热闹场面。沿着长影门前的红旗街，突然沦为审查对象的新老艺术家们强做欢颜，敲锣打鼓，欢迎拯救自己灵魂的宣传队。

而被欢迎的那些人，对于沿途的场面，也真的激动万分。笔者就亲眼看见一位女工宣队员，在大客车的窗口热泪横流。应该公允地说，这些工人师傅中的大多数，是质朴忠厚的。他们在进驻之后，似乎忘记了来对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进行全面专政的崇高使命，反倒很快就成了那些臭老九的朋友。当然，也有例外。尤其是那些担当一点领导职务的工宣队员，显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使臭老九们望而生畏。

当然，我们是在是非经过之后，回过头来评价历史的。除了那些我们今天称做三种人的历史沉渣之外，另外一些人，也许貌似极左，而又并非出于本意。不过在当时，我们同样不能清醒地认识和评价那些可以操纵和掌握我们命运的人。除了特别熟悉的几位工宣队员之外，对于其余各位，一律敬而远之。而对出言不

逊，态度极为恶劣者，我们又都恨在心中。譬如那个矮个的疤拉脸，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在我们那个大队第一次讲话，就慷慨激昂地把“电影骗子们”骂了个狗血喷头。

因为他那张脸几乎全是疤痕，所以我们既不能看清他的表情，也难以辨别他的年龄。只有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露出的冷冷的光，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疤拉脸姓杨，叫杨德才。我曾推测，他原来的那个才字旁边，可能还会有一个贝字。因为赶时代的新潮流，才改成这个才气的才。我个人认为，他还真有一点才气。尤其是运用语言的艺术，简直使我们这些以耍笔杆子为生的人叹为观止。他那一连串的东北土话，俏皮喀，既生动，又刻薄，常常弄得我们这些听众哭笑不得。

譬如，有一次他讽刺我们几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花钱没有计划，说：“瞧瞧你们那几位腰缠五百四十角的公子哥，一发工资，那几个人民币把小兜儿拱得直颤乎，象小雀儿似的，不用手捂着自已格儿就往外飞。一到五商店跟前，眼珠子让饭馆子拴着，大果子拽胳膊面条绊脚，老太太招呼卖冰棍儿，就跟招呼你们名似的。一喊你们就过去……”

类似的精彩片断，不胜枚举。

当然了，杨德才做为工宣队的负责人，总还是有点政策水平的。抓我们这些当时还是年轻人的小辫子，最多不过上纲到“修正主义的黑苗子”、“文艺黑线大染缸的牺牲品”之类。尽管后果触目惊心，终归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对“干柏正彦哪里去了”这样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则是立场非常非常坚定，爱憎非常非常分明的。恰恰是他的这种态度，使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首先，杨德才手拿笔记本，把有关干柏正彦问题的全部大字

报作了几几乎一字不漏的介绍。我至今还认为那几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别有用心的。因为那曲折离奇的故事之中，牵扯到了我们厂许多深负众望的导演、摄影和其他艺术家。其中，最难以解脱责任的是曾在湖西会馆给干柏正彦当过仆役的老王师傅。

解放后，老王师傅在置景间当工人。听说他年轻时，因经常出入妓院，染上了性病。所以，解放后，一直没有再娶，一个人过了二十几年。“文化大革命”到来的前三年，即困难时期退休了。他一个人靠退休金过活，虽然并不富裕，但也不潦倒。据邻居们讲，他的唯一嗜好是酒，甚至达到了爱酒如命的程度。过去他在置景间工作时，腰里挂着一个行军壶，每隔一会儿，便要喝上几口。当时，电影厂的劳动纪律还不象今天这样严格。虽然车间主任没少批评他，但也没少原谅他。退休之后，在喝酒的问题上，他便可以随心所欲了。

杨德才对有关干柏正彦的所有大字报进行研究、分析之后认定，要彻底揭开围绕干柏正彦事件的阶级斗争盖子，首先要打开老王师傅这个突破口。因为据大字报揭发，干柏正彦自杀后，被他的亲信拾回湖西会馆一直到埋葬这段时间里，老王师傅始终在场。又因为长影厂有不少艺术干部，来自满映。那么，干柏正彦的问题一揭开盖子，他们之中就没有几个人可以逃脱汉奸文人的那顶大帽子了。

大队专案组由工军宣传队和革命造反派骨干组成。组长由杨德才自己担任，组员一共有三个人。工宣队员马尔列、谢淑云，外加刚从电影学院分配到长影的女大学生冷冰。专案组在摄影棚二楼一间化妆室贴出一张红纸的招牌，开张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提审当年湖西会馆的仆人老王师傅。

那个年代，中国人办事不大讲求实效，但却很讲究形式。这风气也是由上至下，风靡九洲。如果你还记得“九大”召开的纪

录片，你就不会忘记陈毅同志在摄影机前转过身去，拒绝拍照的情节。因为那座次，也是“四人帮”一伙排定的。左派在左边，右派在右边。当然了，老王师傅是不能与“九大”主席团相比的。他原来给干粕正彦当仆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洋奴。而在许多人看来，给东洋鬼子当洋奴，要比给西洋鬼子当洋奴更低一等。况且，那干粕正彦还是日本天皇的坐探，大特务组织青龙会的首领，那么，老王师傅便在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之列了。

专案组提审，当时还无先例可循。他们只能仿照电影上公安人员审讯犯人的格局行事。杨德才坐在桌子后面，担当主审。谢淑云因为是女同志，又是工宣队员，且又年轻俊俏，理应担当秘书的角色。而冷冰大学刚刚毕业，担当书记员再合适不过了。马尔列英俊潇洒，长得结结实实，站在老王师傅的背后，让被审问者感到有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老人个头不高，面容消瘦。因为长年饮酒毫无节制，鼻子头红红的，整个精神也显得萎靡不振。看样子，离家之前又喝过酒，因为提审的气氛非同寻常，连惊带吓，才有几分清醒。

杨德才盯着老王师傅看了半天，才大声地问：“老王头！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来么？”

老王师傅说：“不知道。”

杨德才说：“不知道？你没到厂里来看过大字报么？”

老王师傅说：“我早就退休了，混吃等死，顾不上那些事。”

杨德才说：“你把自己洗得挺干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几亿人前途和命运的大革命，你倒说顾不上这些事。我问你，你顾得上什么？顾得上你隐瞒反革命历史，顾得上你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么？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老王师傅似乎对杨德才讲的那一切都无动于衷，一个人到了